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 (CND—CM)

• — • — •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 (CND) 主办 • — • — •

—— 增刊 第三〇三期 ——
(二〇〇二年八月二十日出版)

本期目录 (zk0208d)

【研究报告】文革时期群众组织编印的《毛泽东思想万岁》考略	李晓航
【历史疑云】毛泽东为何抛出“王、关、戚”	渔歌子
【史海钩沉】“你办事，我放心”纸字条的来历	章含之
【亡灵祭坛】傅雷之死	狄 马
【往事追忆】红卫兵小报和我（二十）	周孜仁

【研究报告】

文革时期群众组织编印的《毛泽东思想万岁》考略

• 李晓航 •

“文化大革命”初期，一些红卫兵群众组织将他们搜集到的曾在过去报刊发表过的毛泽东论著和毛泽东的内部讲话、文稿、批示、批语等，编印成《毛泽东思想万岁》等各种版本的毛泽东论著集（以下简称“万岁本”）〔1〕，许多篇目是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选集》（1—4卷）、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著作选读》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编印的《毛主席语录》所没有的。所辑文稿对绝大多数人来说，闻所未闻。因而这些版本一问世便风靡一时，被争相翻印。许多人为能读到大量未公开发表过的毛泽东文稿感到欣喜，并以拥有为荣。但由于它是一种非正式出版物，出版不久，便受到了查禁，成为毛泽东著作出版史上昙花一现的一个特例。

（一）“万岁本”的出现及其内容

“万岁本”等非正式毛泽东著作出版物，完全是“文革”特殊历史背景下的产物。

一、是“文革”制造个人崇拜的需要。“文革”初期，全国掀起了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浪潮，主要形式就是大学毛主席著作。林彪鼓吹“一句顶一万句”、学“最新最活”“警句”和“语录”等形式主义作法，希望“使同志们更多地学到毛主席著作，促进思想革命化”，〔2〕“尽可能多地读到毛主席的书，听到毛主席的话，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这一马列主义最锐利的武器。”〔3〕极大地激起了群众对毛泽东著作的狂热兴趣。这种形式主义的学习方法必然进一步发展为文本研究和求索，原来已经出版的、只包括建国以前内容的《毛泽东选集》四卷，已经不能满足这

种狂热的社会需要。

二、无政府主义是毛泽东著作广泛非正式出版的源头。“文革”是突然发动的“史无前例”的无政府主义运动，毛泽东的指示成为唯一的指导准绳，而毛泽东的一些具体指示在当时只限定于中央文革小组等极少数人知晓，其他人包括中央领导人都毫无思想准备，措手不及。因此，广大群众、干部都热衷于从毛泽东的一些内部讲话、文稿里去寻找新问题的答案。1966年5月，清华大学附属中学一批年轻人秘密成立了“红卫兵”组织，以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这段话来自毛泽东1939年12月21日在延安各界庆祝斯大林六十诞辰大会上的讲话）这段语录为依据，撰写了三论“造反有理”大字报。学校工作组以公开出版著作中没有这段毛主席语录进行质疑，双方发生了激烈对抗。结果毛泽东支持了红卫兵，8月26日《人民日报》公开发表了这段语录，成为风靡一时的口号，也实际上认可了使用非正式毛泽东论著的做法。于是，以未曾发表的毛泽东指示作为政治斗争中的支持依据，被各种群众组织广泛运用。此后，中宣部等新闻出版管理机构瘫痪，中央文革小组的“中央领导人”又在讲话中不断披露毛泽东“最新指示”，造成了毛泽东论著发布和出版的无政府主义状态。

以上诸多因素，终于使“万岁本”非正式毛泽东论著出版物应运而生。

编辑“万岁本”的资料来源，大致上有以下几种：

一、查抄或其他手段取得的中央内部文献。“文革”前，中央成立的毛主席著作编辑委员会整理和编辑了大量毛泽东文稿，一部份已编入《毛泽东选集》四卷，一部份准备用于第五卷，还有一部份作为备选和参考资料。此外，毛泽东建国后的一些重要讲话和文稿，为中央起草的文件等（如“论十大关系”、“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读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谈话和批注”等），曾经整理后作为中央文件发到高级干部范围，指导工作。在“文革”中，造反派对有关部门“走资派”抄家和抢劫机要部门档案时，得到这些文献，将其流传到社会上。还有一些中央和国家机关的造反派夺权后，违反保密规定，擅自从档案中取出有关文献，内部编辑印发。

这些文献来源可靠，有较高价值，但因为并非定稿，所以往往与“文革”后出版的正式毛泽东著作集所收文稿在编辑加工上有较大差异。

二、发表于公开出版物，但未收入毛泽东著作集者。内容包括：建国前在早期文化刊物和各解放区出版的报刊书籍中曾发表的一批毛泽东论著，如《新青年》、《湘江评论》、《解放》周刊、《新中华报》、《苏维埃中国》、延安《解放日报》、《向导》周报、《群众》周刊、《动员》、《中国农民》、《政治周报》、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1948年版《毛泽东选集》、东北书店1948年版《毛泽东选集》以及各种毛著单行本等。建国后，在《人民日报》、《新华月报》、《新华半月刊》、《红旗》等报刊中公开发表但未收入毛泽东著作集的言论、文章、指示等。

这些文献来自公开出版渠道，比较可靠，但与“文革”后出版的正式毛泽东著作集也存在着少量编辑加工的文字差异。

三、一些毛泽东的战友、亲友、故旧或身边工作人员回忆毛泽东的谈话及保存的有关书信。如与毛远新、王海容的谈话等。这些资料在“万岁本”中所占比重不大。

四、“文革”中报刊、文件上新公布的及有关领导人传达、披露的毛泽东谈话和“最新最高”指示、批示等。这些资料因其政治性质，在“文革”后出版的正式毛泽东著作集里多不再收录，

故有特殊的价值。

由于材料来源不同，“万岁本”各种版本所收的篇目差异颇大，有的版本收入的篇目多达六百余篇，有的仅收十余篇，很少有两种版本收入的篇目完全相同的情况。即便是翻印本，也往往与所据蓝本不尽相同。由于不断增加内容，翻印本收入的材料往往比蓝本更加丰富。所收建国前的文稿，大都有旧刊可查，通常在文稿后面注明出处。建国后毛泽东的许多讲话、谈话等，由于从未正式公开发表过，故没有注明出处。

从内容看，“文革”时期非正式出版的毛泽东论著，大致可分作五类，一是综合性选集，二是专题性选集，三是书信选集，四是手迹选集，五是合著集。属于综合性选集的“万岁本”，据河南一位毛泽东著作收藏者马清学收集到的版本，1966年至1969年间，大约出了300多种，最早的出版于1966年底，绝大多数版本出版于1967年。除《毛泽东思想万岁》之外，类似性质的综合性选集书名，还有大约60多个，例如《毛泽东思想胜利万岁》、《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学习文选》、《毛主席讲话》、《毛主席文选》、《毛主席言论集》、《毛主席著作编外》、《东方红文选》、《伟大的文献》、《重要文献》等等。在专题性选集中，教育方面的较多，如1967年5月红代会北京师范大学井冈山公社、北京师范大学编印的《毛主席教育文选》、1967年武汉编印的《毛主席的教育思想万岁》等。书信选集有1968年7月出版的《毛主席书信选集》等。手迹选集中，影响较大的是1967年2月郑州出版的《毛主席手书选集》。合编本中较常见的，是汇集了毛泽东与林彪及其他中央领导人的讲话、著作的《毛主席、林副主席及中央首长讲话》等。

所有“万岁本”的版本，在编选时均不约而同地遵循著一个共同的原则，即选收那些未收入《毛泽东选集》（1—4卷）、《毛泽东著作选读》、《毛主席语录》的文稿。有的版本专收建国前的文稿，有的专收建国后的文稿，有的则将建国前和建国后的文稿合编在一起。这些文稿包括：毛泽东的论文、书信、批示、批注、按语、电文、诗词、题词、祝词等成文著作和讲话、谈话、口头指示等口述材料。除此以外，有的版本还收入了毛泽东的回忆、毛泽东建国后革命活动的通讯、林彪和周恩来等中央其他领导人的讲话，以及一些重要社论等。目前所见收录最早的文稿是1910年的《毛主席看完〈世界英雄豪杰传〉对书主人的谈话》（4）。有些文稿的时间，编者无法弄清，在处理上，或根据内容判定其大约时间，或采用所刊载的报纸、杂志的时间。编排通常以写作或发表时间为序排列，也有的按著作体裁编排。有些版本，由于个别文稿原无标题，编者根据文稿内容加上标题。有的文稿，或因不易见到全文，或因不便全文付印，故只摘录部份内容付印。

也有极少数版本选收了《毛泽东选集》（1—4卷）已收过的文稿，但所依据的版本是建国前出版的《毛泽东选集》，因而文字上与建国后《毛泽东选集》四卷本有所不同。对《毛泽东选集》（1—4卷）已收过的文稿或已公开发表过的文章，有的版本采取只存目，不录文的办法处理。

从版本看，由于“万岁本”收入的著作篇目较多，篇幅较大，多采用容量较大的16开本和32开本（也有个别将字体排得很小的大64开本，类似《毛主席语录》）。有一卷本，也有多卷本。印刷方式多为铅印，也有个别为油印。装帧形式有平装、塑套装和硬壳精装。相当一部份版本的封面为红色，有的还在封面印上毛泽东头像等。许多版本的正文前后，有“编者说明”之类的文字，说明编印目的、编选体例等，这些文字对于研究“万岁本”有著重要的参考价值。

由于“万岁本”是供内部学习的资料，限于出版单位内部发行，因而每一种版本的印数十分有限，通常也没有定价。大部份版本或在封面、或在书名页、或在封底标有“内部资料”严

禁外传”、“内部文件 不得外传”之类的文字。有的版本还在前言中郑重声明：“凡得到这本书的同志，务必妥善保存，不得外传，严禁翻印。此书仅作内部学习参考，绝不许公开引用。诚请同志们当作一条革命纪律，严格遵守。”〔5〕实际上在连中央规定都难以实行的“文革”动乱中，这种声明只是空言。多数版本没有版权页，出版者和出版时间大都印在封面或书名页，有的版本只标明出版时间，未标明出版者。还有的版本既未标明出版者，也未标明出版时间。类似这种出版物不讲版权的情况，在“文革”时期是普遍存在的。

从编辑者看，“万岁本”多是以各种造反派组织的名义编辑出版的，也有许多版本没有署名，十分庞杂。以笔者所见，编者以各地大专院校、中学的红卫兵居多，如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航空学院、北京师范大学、外交学院、上海交通大学、武汉大学、吉林大学、南开大学、南京军事学院、成都地质学院、河北纺织工学院、西安冶金建筑学院、南昌市第十八中学等，均编印过这类版本。一些机关、企业、科研单位的造反派组织，也编印过这类版本，如国家科委、外文局、北京电影制片厂、贵州省第一轻工业厅等。从地区看，编印过这些版本的省、市、自治区涉及北京、上海、天津、河北、黑龙江、吉林、辽宁、河南、湖北、陕西、江苏、江西、贵州、内蒙古等。军队系统除军事院校外，极少编印这类书籍。

由于“万岁本”的编者大多是一些非专业人员，缺乏专门的编辑训练和必要常识，造成这类出版物存在一些明显的问题，归纳起来，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编选体例比较杂乱，多数版本是按时间顺序编排的，但常常并不十分严格，随意性较大。二是个别版本收录的个别文稿，编者没有弄清准确的写作时间或发表时间，只有篇名，没有标出著述日期，如《谦虚一戒骄》、《给侄子的亲笔信》等。三是有的版本由于多次辗转传抄，个别文字不准确。

由于编辑出版“万岁本”正是“文革”燎原全国之时，毛泽东在过去文稿中提到的一些领导人已被打倒，这些人的姓名在编印时便被“×××”代替，或在姓的后面加上“××”。例如一封写于1963年12月16日的信，标题便是《给林彪、××、聂荣臻、肖华诸同志的信》〔6〕。有的版本，当文稿中出现被打倒的领导人的姓名时，编者甚至将姓名中的某个字倒印，以示将其“打倒”。这可以说是“文革”中的特异现象。

（二）“万岁本”受到查禁

被冠以宣传、普及毛泽东最新最高指示的这场出版“万岁本”的热潮，很快就遭到了中央的制止和查禁、销毁。据笔者考察，在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等国内各大图书馆，均没有收藏“万岁本”。这是为什么呢？需要考察其被禁的过程。

早在建国初期，中央就作出决定，毛泽东著作与党和国家其他领导人的著作，统一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任何非指定出版机构无权出版这类书籍。1959年10月13日，中央针对当时个别单位擅自印发毛泽东的有关指示的做法，下发了关于纠正乱印乱发毛泽东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讲话记录的指示。然而，“文革”开始后，对出版毛泽东著作的规定，被造反派视为反对和限制出版毛泽东著作。这是任何人都担当不起的罪名，于是，“万岁本”的印刷出版达到了高潮。1967年中央发现这种情况后，立即予以制止。仅1967年5月至11月，中央就连续下发了五个文件，严令禁止各地非法编印毛泽东著作，对已经编印出版的，要求各地回收上缴。

1967年5月14日，中共中央印发了《关于改进革命群众组织的报刊宣传的意见》。这个文件在第二条规定：“毛主席、林副主席没有公开发表的文章、讲话、批示，都一律不许擅自刊登和印发。中央的内部文件、会议记录和负责同志的内部谈话，一律不要擅自刊登，也不要以小册子和其他形式编印流传。”〔7〕

1967年7月13日，中共中央印发《关于建造毛主席塑像问题的指示》。这个指示除了要求各地由中央统一规划建设毛泽东塑像外，还提到：“各地编印了一些毛主席没有公开发表过的讲话材料，甚至将别人的讲话、诗词也编进去了。中央重申：毛主席没有公开发表过的讲话、文章、文件、诗词，未经毛主席和中央批准，一律不得编印，不得出版发行。出现这种事情，也请你们加以制止。”（8）

1967年10月21日，中共中央印发《关于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查获一个非法编印、贩卖毛主席著作的投机倒把集团的通报》。这个通报说：“最近，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查获了一个非法编印、贩卖毛主席著作的投机倒把集团。该集团非法地搜集了未公开发表的毛主席的讲话、文章、信件、批示二百余篇，编成所谓《重要文献》，大量出售。这个《文献》不仅泄露了党的机密，而又差错很多。这是极其严重的政治问题。必须认真追查，严肃处理。印发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著作，是一项极其严肃的政治任务，任何单位、组织和个人都不得私自编印。为此，中央再次重申：‘毛主席没有公开发表过的讲话、文章、文件、诗词，未经毛主席和中央批准，一律不得编印，不得出版发行。’望认真执行。今后，凡属这类非法印刷品，均应彻查法办，并首先责成北京、上海两市革命委员会贯彻执行。”（9）

1967年11月18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印发《关于严禁在书刊、传单上泄密问题的通知》。这个通知说：“为杜绝在书刊、传单上泄密事件，中央重申，任何群众组织或个人，严禁擅自印发未公开发表的毛主席和其他中央负责同志的著作、讲话和翻印、转抄机密文电。凡抄家抄来的毛主席著作手稿、机密文电及其它物品，应一律上交当地革委会（筹备小组）或军管会（军区），绝不准私自留存、复制或擅自处理；已非法印发的有机密内容的报刊、传单、小册子，由印刷单位负责回收上缴。”（10）

1967年11月27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印发《关于严禁私自翻印未发表过的毛主席照片的通知》，再次重申：“印制、发表毛主席的照片和作品，是一个极其严肃的政治问题，决不能擅自行事，更不允许那些别有用心的人乘机捣乱。因此，中央决定：凡是未公开发表过的毛主席的照片和作品，不论个人或集体像，未经中央审查同意，一律不得私自翻印。此事以前业已通知过，现在再通知一次，望你们按此通知严格监督执行。”（11）

中央在一年中连续下发五个文件，反复制止并要求查禁各地群众组织编印出版毛泽东著作集，这是非同寻常的，也是绝无仅有的，可见当时编印此类书籍之风何等盛行。从以上五个文件中，至少可以得到这样几个信息：第一，中央对未经允许擅自编印这类未发表过的毛泽东著作极为重视，视为“极其严重的政治问题”。第二，这些文件没有否认这类书籍收入的不是毛泽东著作，没有说它们是伪作或他人之作，相反，10月21日印发的文件正面承认《重要文献》之类的书籍“搜集了未公开发表的毛主席的讲话、文章、信件、批示二百余篇”。第三，这些书籍之所以受到查禁，是因为“未经毛主席和党中央批准”，“不仅泄露了党的机密，而又差错很多”。

最后，我们今天还可以归纳出的一个原因是，“文革”前毛泽东论著的流行，将影响“文革”中毛泽东指示的权威性。正如我们今天所认识到的，毛泽东在“文革”中的错误，正是违背了他在长期革命和建设斗争中总结出的一系列党的正确理论、方针和政策，违背了毛泽东思想。因此，当群众从过去未曾披露的毛泽东论著中看到许多被“文革”批判打倒的，正是毛泽东过去曾经肯定或坚持过的，必然会对“一贯正确”等个人崇拜说法产生怀疑。当然，这个原因是不能写进文件的。

由于当时党组织处于瘫痪状态，这五个文件先后下发后，各地、各单位无法严格遵照执行，

很难有效地制止类似出版物继续出版和流传，屡禁不止。有的群众组织认为“宣传毛泽东思想没有错”，仍然阳奉阴违，照出不误。例如，湖北省应山县革命群众组织联络委员会于1967年5月18日编印了一本《毛主席重要指示及讲话汇编》。该书在《说明》中说：“我们收集了一部份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尚未正式发表的重要指示和讲话，原准备编印成册，供给革命的同志们学习。后因中共中央通知：‘毛主席、林副主席没有发表的文章、讲话、批示，都一律不许擅自刊登，也不要以小册子和其他形式编印流传。’根据中央这一指示精神，我们即停止了印刷，现将已印部份装订成册，供同志们学习。”

1969年底，中央发出关于保密工作的指示，要求各地普遍开展保密大检查，收缴非法印刷品。这时各地革命委员会均已成立，使中央的各项指示能够得到有效落实。据西安市革命委员会当时的一份文件披露，1970年1月至4月，西安在全市范围广泛开展了以清理文件、收缴非法印刷品为重点的群众性保密大检查，检查中“发现了大量失密、泄密违反保密制度的现象。如：违反中央规定，擅自印发伟大领袖毛主席、林副主席的指示和中央首长的讲话；擅自编印毛主席、林副主席语录”（12）。全市共收缴这类非法印刷品三十多万册和大量传单。由于各地认真贯彻执行中央指示，1970年后，社会上不再有人编印“万岁本”，收缴的均予销毁，仅有少量“万岁本”流入了民间。同样的原因，全国各地图书馆也都没有收藏这类书籍。

（三）研究与思考

对“万岁本”的研究和使用首先是在境外。

首先，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海外学者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收集毛泽东和中共党史、中国当代史研究资料和著述十分困难，感到材料匮乏，而且《毛泽东选集》（1—4卷）没有收建国后的文稿（第5卷虽然收录了少部份，但不久即收回），他们要研究建国后的历史和毛泽东，就不得不主要借助于“万岁本”等。

其次，由于公开出版的《毛泽东选集》（1—4卷）及各种单行本著作，发表前经作者亲自校阅过，作了一些修改，与文章最初撰写时的原始形态有一定变化（比如，《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从讲话之时到正式发表，相隔两个多月，修改十余次，一些观点和态度都与讲话时有重要不同）。因此，境外学者认为，“万岁本”的资料更为真实地反映了作者的撰写初衷，是对《毛泽东选集》（1—4卷）的补遗，因而倍受他们青睐与重视。

境外学者在搜集、编译和利用这批资料上耗费了大量的时间和人力、物力。美国新泽西普林梯斯·霍尔公司于1969年出版了《毛：伟大的生平》，牛津大学出版社于1970年出版了《毛的文献：文选和篇目提要》，香港明报月刊于1971年出版了丁望主编的《“毛泽东选集”补遗》，美国联合出版物研究署于1974年出版了《毛泽东思想杂集》，美国弗吉尼亚州奥克顿的中国资料研究中心于80年代初影印出版了《毛泽东讲话和文章汇集》（全套23卷，共计5500页，这是英文版本中收入毛泽东著作最多的一种资料），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于1981年3月出版了《毛泽东著作年表》。这些海外出版的毛泽东著作集，主要来源就是红卫兵等群众组织编印的《毛泽东思想万岁》、《学习文选》等资料。

1989年，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主任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等三人，根据《毛泽东讲话和文章汇集》编译出版了《毛泽东的秘密讲话——从百花时期到大跃进》。他们认为，由红卫兵组织编辑出版的《毛泽东思想万岁》的材料是可信的。这是因为，一方面红卫兵对毛泽东无限崇拜，不可能擅自篡改毛泽东的讲话。另一方面，这些材料的来源可靠——第一，是红卫兵在“抄家”或其他“革命行动”中，从那些亲自聆听过并记录了毛泽东讲话的人那里得到的。讲话中完整地保存了毛泽东的口语和习惯用语，这也证明了它们的真实性。第二，是从《湘江评

论》、《苏维埃中国》、《政治周报》、《向导》、《新华日报》、《解放日报》、《新华月刊》、《新华半月刊》、《人民日报》、建国前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等报刊、书籍及其它文件中选出来的。日本私立立教大学教授野村浩一也持相同看法：“我认为这些文章，还是有很大可靠性的，经过必要的研究和整理之后，可以适当地加以利用。”〔13〕

在研究著述方面，境外学者研究毛泽东及建国后中共党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均把“万岁本”作为重要的依据加以引用。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的《文化大革命的起源》（一、二卷）（求实出版社1990年2月第1版）有187处引用了1967年和1969年编印的四种版本的《毛泽东思想万岁》；斯图尔特·施拉姆的《毛泽东的思想》（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12月第1版）有62处引用了1967年和1969年出版的《毛泽东思想万岁》、《学习文选》、《资料选编》等；R·特里尔的《毛泽东传》（河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5月第1版）有86处引用了1967年和1969年编印的《毛泽东思想万岁》；迪克·威尔逊的《历史巨人毛泽东》（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7月版）有43处引用了多种版本的《毛泽东思想万岁》。海外学者引用较多的“万岁本”有两个，一个是1967年出版、收录毛泽东1959年至1961年间51篇文稿的《毛泽东思想万岁》，另一个是1969年8月出版、收录毛泽东1950年至1968年间113篇文稿的《毛泽东思想万岁》。这些使用非正式引文的著作在“文革”后经由包括中央有关出版社的国内出版社出版，也间接地承认了其可靠性。

与境外学者相比，“文革”过去了几十年，国内研究毛泽东的有关资料范围已经得到极大的开拓，但“万岁本”在中国大陆学者中一直没有得到研究，更没有广泛使用。一些专门收录、介绍毛泽东著作版本的工具书，如袁竞主编、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1年出版的《毛泽东著作大辞典》和方舟、许京生主编、华文出版社1993年出版的《毛泽东图书辞典》等，都没有列入这方面的内容。迄今收录毛泽东著作版本最多、施金炎主编的《毛泽东著作版本述录与考订》，也只收录了寥寥几种香港、国外出版的《毛泽东思想万岁》和《毛泽东思想万岁》翻译版本，而对原版的《毛泽东思想万岁》则没有加以介绍。从公开学术论文看，1999年以前，基本没有大陆学者引用“万岁本”的情况，只有在有关国外毛泽东研究状况的文章和书籍中，才偶尔见到零星介绍“万岁本”的文字。

出现这种情况，显而易见的第一个原因，自然是“万岁本”都是非正式出版物，大家对其持有谨慎态度。二是由于这些资料绝大多数都已散佚，目前存世的较少，一般学者难以找到，因而无法利用。三是由于“万岁本”大多数没有版权数据，引用时无法明确注明，因此学者间难以有共同的依据进行分析探讨。

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中国大陆学者中已有人开始关注并著手研究“万岁本”。如刘跃进撰写的被廖盖隆誉为毛泽东著作版本学“奠基之作”的《毛泽东著作版本导论》一书，较深入地考察、介绍了国内外不同时期出版的众多毛泽东著作版本，其中第五章《特殊版本》第三节《非正式版本》，作者用十多个页码的篇幅，详细介绍了十多种不同的“万岁本”。这是迄今为止国内外对“万岁本”介绍得最详尽的文字，将毛泽东著作版本研究的范围大大予以拓宽。尽管作者掌握的有关资料还十分有限，也缺乏系统的研究，但可以说是国内开先河者。再有，近年来出版的有关毛泽东研究和“文革”研究的专著中，有的学者也开始谨慎地引用“万岁本”的材料。例如中央党校副教授张志明博士著《走出迷谷——1967—1979年中国政体改革的历程与思考》（江西高校出版社2000年8月出版），书中引用的毛泽东在“文革”时期的一些讲话，就注明引自1967年3月31日编印的《毛泽东思想万岁》和1969年3月编印的《毛泽东思想胜利万岁》等版本。

今天我们应如何看待“万岁本”等资料呢？笔者认为：首先，“万岁本”等是非正式出版物，没有经过规范的审查、核对、编辑，一些内容存在著文字错误，甚至有张冠李戴、以讹传讹的

严重失误。因此，在专业研究以外的场合（如传播范围较大的学习、宣传材料等），一般不宜作为严谨的、权威的毛泽东言论来正式引用。其次，“万岁本”产生于特殊的时代，以特殊的方式流行，取材广泛，内容丰富，其中绝大多数保存了一定的历史文献原貌，对于研究毛泽东（尤其是晚年毛泽东）乃至中共党史和中国当代史，具有一定的资料参考价值。因此，在研究范围，作为资料和宏观背景可以适当参考使用。比如，研究毛泽东在特定历史时期的心态变化、思想轨迹、活动交往情况等。再次，要尽可能与经过修订、已经公开出版的《毛泽东选集》、《毛泽东著作选读》、《毛泽东文集》、《毛泽东早期文稿》、《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毛主席语录》等正式文本相对应进行校勘，确定其真伪，比较其异同，再谨慎地使用公开本中确实没有的内容。最后，在引用时，还须注明出处，表示供读者参考之用。

参考文献：

- （1）石仲泉在《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发表的文章里将《毛泽东思想万岁》各类版本统称为“万岁本”。我征求对这类版本素有研究的专家的意见，也认为称“万岁本”是比较合适的。
- （2）《毛泽东思想万岁》（第一集），西安冶金建筑学院文革筹委会1967年5月编印，“编后”
- （3）《毛泽东思想万岁》（第二期），北京钢铁学院革命造反红卫兵毛泽东思想小组1967年1月25日编印，“编后说明”
- （4）见河北纺织工学院八一八红旗1967年4月编印的《毛泽东文选》（上）
- （5）《毛泽东思想万岁》（上），河南二七公社河南农学院红卫兵总部1967年8月编印，“前言”
- （6）《毛泽东思想万岁》，1967年5月编印，第155页
- （7）《中共中央文件》，西北大学文革筹委会山鹰战斗队1967年10月编，第194页
- （8）《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文件汇编》，湖北省革命委员会1968年7月编，第272页
- （9）《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文件汇编》，湖北省革命委员会1968年7月编，第372—373页
- （10）《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文件汇编》，湖北省革命委员会1968年7月编，第422页
- （11）《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文件汇编》，湖北省革命委员会1968年7月编，第423—424页
- （12）《西安市革命委员会文件》，市革发（1970）039号，第5页
- （13）《日本学者视野中的毛泽东思想》，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9月第1版，第65页

□ 原载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资料》2002年第4期

【历史疑云】

毛泽东为何抛出“王、关、戚”

• 渔歌子 •

《华夏文摘》增刊二八八期 / “文革博物馆通讯”一二七期上陈益南《文革中若干尚不清楚真实内幕的高层人事问题》一文提出了一些很有意思的问题，其中第三个问题是：“毛泽东为何突然要将王力、关锋、戚本禹整下去？”问题提得很好，作者的思考也很能给人启发。作者指出，在武汉“七二〇事件”后，“被中央文革视为十恶难赦的陈再道，却被毛泽东特批‘同志’称呼，并没被打倒，仅送去学习而已。可是，文革‘功臣’的王力、关锋却……在莫名其妙中倒被关了起来。”“根据现能看到的资料中说，是由于王力于当年8月7日对外事口造反派作了一个著名的‘八·七讲话’，之中，观点极左得很。另外，则是王力、关锋在当年当期的《红旗》

杂志上，组织发表了一篇文章，提出了‘揪军内一小撮走资派’与‘带枪的刘邓路线’口号，因而，激起了毛泽东对王、关、戚的不满，指责他们是‘毁我钢铁长城’。”“当时的解放军代总参谋长杨成武在其回忆中，也说了周恩来让他将包括上述内容的材料，送给正在外地的毛泽东批阅的情况。当时，毛泽东在看了材料后，让杨成武在毛泽东住地等一天，然后，第二天，毛泽东才作出抓王力、关锋的决定。开始，毛泽东的命令中，还包括了抓戚本禹，但在向杨成武下达他的决定令后，中途，又犹豫了一下，结果，还是让杨成武在命令中去掉了戚本禹的名字，说：对戚先再看看，以观后效。”

作者提出：“问题是：究竟是什么具体原因，促使毛泽东决定让王、关、戚下台呢？如果说因对上述王力的‘八·七讲话’与《红旗》杂志上的‘揪军内一小撮’的观点言论不满，按常情，毛泽东完全可以对他们进行指责纠正就是，也可以撤去他们的一些负责职务，也完全属执行正常工作纪律。但，一下子却将他们三人抓起来关进监狱，上述理由似不够充份。毕竟，王、关、戚都是协助他毛泽东、为文革进行而推波助澜的干将，是属于毛泽东的‘无产阶级司令部’里面的人，何况，十天前（引者注：王力、关锋被逮捕的时间是8月30日，此前的7月25日天安门欢迎王力大会按推算应为36天前），中央还将王力作为一个文革大功臣而举行过盛大的欢迎大会呀！”因此作者提出质疑：“周恩来托杨成武送给毛泽东的材料中，究竟还有什么内容？是否还有些杨成武现在也不能说的东西呢？”“为什么毛泽东在看了杨成武送来的那些材料后，不能马上作答，而需要他思考权衡一整天？”“当时毛泽东能宽容有反中央性质的武汉‘七·二〇’事件的首要陈再道，为什么他却会下如此大的决心，对王、关、戚采取一杆子整到底的断然措施？”

陈益南先生的思考，使我想到了有关“王、关、戚”事件的两条“最高指示”。

一条是毛泽东对处理“王、关、戚”问题的指示，即毛泽东在上海要杨成武回北京向周恩来转达的口头指示：“王、关、戚是破坏文化大革命的，不是好人，你只向总理一人报告，把他们抓起来。要总理负责处理。”此外，毛泽东“并对王力八月七日讲话批：‘大、大、大毒草’。”（见《周恩来年谱 1949—1976 下卷》183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5月版）

另一条“最高指示”，则是至今未引起人们足够重视（或是被一些人有意“忽视”）的毛泽东亲笔批示。9月7日，毛泽东在戚本禹写于9月4日的检讨信上批示：“已阅，退戚本禹同志。／犯些错误有益，可以引起深思，改正错误。便时，请你告之关、王二同志。”（《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412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1月版）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批示（可称之为“九七批示”）的日期是在作出前一指示（8月26日）的近一个半月之后。然而，“九七批示”的提法、语气，与前一指示显然有着本质的不同，前一指示认定王、关、戚犯了“破坏文化大革命”的逆天大罪，而“九七批示”却认为他们只是“犯些错误”（并认为这“有益，可以引起深思”）；前一指示称他们“不是好人”，而“九七批示”却称之为“同志”，前一指示叫“把他们抓起来”，而“九七批示”却似乎不存在他们已被抓起来了的事实，还嘱戚本禹将他的这个批示“便时”“告之关、王二同志”（可以想见戚本禹看到此批示时哭笑不得的表情）。“九七批示”的态度是善意的，温和的，爱护的，同志式的，而且，显然毛泽东对戚本禹的检讨是认可的。戚本禹检讨了些什么呢？从《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编者为“九七批示”所加的注释中可知，戚本禹检讨了这样三点“严重错误”：（一）错误地估计了全国的形势，把斗争过程中的反复现象，看作是全国出现了资本主义复辟，看不到革命群众的斗争成果和力量。（二）错误地估计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报纸、电台到处号召“抓军内一小撮”。（三）怀疑一切，随便动摇毛主席司令部的领导。按照这三条，王、关、戚只是思想认识问题，并非“破坏文化大革命”的重罪。

毛泽东的态度，怎么会在一个半月之间发生这么大的变化？这不由得使人“多问几个为什么”。

前一个指示，没有原文，只是杨成武根据自己的笔记记载向周恩来传达的，而且按照指示中的要求，“只向总理一人报告”；而“九七批示”则是毛泽东的亲笔（《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注明是“根据手稿刊印”）。按说，这后一个批示的份量应更重些。然而奇怪的是，前一个指示，当时很快就通过官方的或民间（造反派红卫兵）的渠道传遍全国（同时传遍全国的还有另一些相关的“最高指示”，如“打倒王力，打倒，打倒”，“打倒王力，还我长城”之类），而这后一个“九七批示”，却始终没有公开传达，无人知晓。须知，若是在当时就传达出来，“王、关、戚”诸人定会如释重负甚至欢欣鼓舞，正如陈再道得知毛泽东在一个批示中仍称他为“同志”一样，马上就会明白自己的“问题”性质已定为“人民内部矛盾”，不会被打倒了。可是，当时“九七批示”并未传达出来，因此不仅“关、王二同志”继续身陷囹圄，“戚本禹同志”不久也跟着进去了。那么，又是谁封锁了这个“九七批示”？为什么？从“九七批示”可以看出，毛泽东并未将“王、关、戚”视作“坏人”或“罪人”。那么，为什么又要让他们下台呢？

有一则故事，从另一侧面道出了事情的某些玄机。

在宗道一《“王八七讲话”与外交部“夺权”闹剧》（载《中华儿女》2002年第一期35—42页）一文中谈到，王力、关锋在8月底被捕后，因中央对外秘而不宣，直到9月底人们都还没有得到这方面的消息。外交部反对王力一派的刘华秋和王海容等急于了解毛泽东的态度，便在9月24日凌晨毛泽东刚回到北京时，由守候在中南海的王海容去向毛泽东汇报王力“八七讲话”在外交部如何不得人心，想探听毛泽东的态度，而毛泽东却只吟出了两句古诗：“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然后就以要休息为由对这位表侄孙女下了逐客令。王海容回来汇报后，刘华秋等人翻遍唐诗宋词，也没有找到这两句古诗的出处，只得去请教王海容的爷爷王季范老先生。这才知道这是出自晚唐诗人罗隐《筹笔驿》诗中的句子。于是，刘华秋、王海容等人认定王力倒台已成定局，“当天，王海容、刘华秋将这一情况用最快速度报告了周恩来总理，同时又大胆撰写了题为《王八七讲话是一株大毒草》的大字报……”

按宗道一文中所述，刘华秋、王海容等人当时对罗隐这两句诗的理解，是“曾经不可一世的‘英雄’已经被历史的车轮辗得粉碎”。其实，这个理解是文不对题的。罗隐《筹笔驿》是凭吊诸葛亮的，“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的原意，充满对诸葛亮虽有雄才大略，然而因时运不济，终于壮志难酬的感叹。原诗句对这位失败的英雄只是表现出痛惜，哪里能从中体会出什么“被历史车轮辗得粉碎”的意思？若再联系上原诗中这两句的前边两句：“抛掷南阳为主忧，北征东讨尽良筹。”就更可以看出作者对诸葛亮这位失败的英雄的衷心赞美了。毛泽东引用这两句诗，其实应该理解成是对王、关、戚的倒台充满不得已的痛惜之情。若是按刘华秋、王海容当年的那种理解，毛泽东完全可以而且应该引用另外的诗句，如“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之类，这样内容和感情的诗句多的是。然而毛泽东却偏偏引用了这样两句，这不是曲折地反映出了毛泽东对抛出王、关、戚的无奈心境吗？

“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所表达出来的对王、关、戚的感情，与毛泽东“九七批示”是一致的。他并未将王、关、戚归入应被打倒的敌人之列，而只是迫于当时的某种形势，不得不抛出他们来作牺牲，以求得政治上的平衡。他这个亲自发动和领导了“文化大革命”的史无前例的大“英雄”，有时候也不得不受“时运”的制约，他也常常是“不自由”的啊！

那么，毛泽东当时为什么会感到“运去英雄不自由”？当时有什么形势逼得他非要以王佐断臂的决心抛出王、关、戚？这还有待历史档案的揭秘及人们更深入的研究。

~~~~~  
【史海钩沉】

“你办事，我放心”纸字条的来历

• 章含之 •

1976年4月30日，毛主席会内见新西兰总理马尔登，华国锋陪见。当天，冠华回家，告诉说在会见前，华国锋要他在人民大会堂等候。

当时，毛主席的健康已很不好，说话已很不清楚，有时需要写下来。毛主席身边的人就捡那些条子收藏。我曾对冠华说，哪天，我也拿几张，留作纪念。当时，冠华说：“你千万不要去拿这些条子。这些条子都没有上下文，假若主席百年之后，有人断章取义利用某张条子，而它恰恰在你手里，你如何是好？”

这天，冠华说：“主席今天又写了三张条子，是在外宾走后单独与华总理谈国内问题时写的，被华总理收藏起来了。”他说会见完外宾后，华国锋总理来到福建厅时，很高兴地给冠华看那三张主席亲笔写的条子：“照过去方针办。”“慢慢来，不要招（着）急。”以及“你办事，我放心”。

也许是命运注定的劫数，冠华偏偏问华国锋这“你办事，我放心”是讲什么事，当时华说他汇报了四川贵州的“批邓”运动搞得不深入，造反派热衷打内战，拟将两派叫到北京，要他们集中“批邓”。华说主席累了，就写了这个条，叫我去办了。当天晚上，政治局开会传达毛主席会见外宾谈话及其他指示。

深夜，冠华回到家时对我说：“有件事很奇怪，华总理下午明明给我看三张条子，到了政治局会上，他只让大家传阅了两张，那张‘你办事，我放心’没有拿出来。”我随口说：“你不是说这类没有上下文的条子日后很容易作任何解释吗？”冠华说国锋同志为人忠厚，我猜他是出于谦虚，不拿出来。此事我们也就淡忘了。

五个月后的10月6日，粉碎四人帮时，冠华正参加完联大会议后顺访法、意两国。在巴黎时听到消息，他与曾涛大使举杯畅饮。他哪里会想到此时的华国锋已对外交部领导说“乔冠华大概要逃跑，我们可以派架飞机把他老婆送去！”同时，他把那三张条子发到全国，尤其是“你办事，我放心”，被说成是毛主席指定他当接班人的依据。华国锋向外交部领导说：“乔冠华是最先看到‘你办事，我放心’这张条子的，他明知主席的意见，却抵制毛主席的指示，并向外交部党组封锁消息。”

于是，在冠华回国后，一项“抵制毛主席临终指示，反对华主席任接班人，配合四人帮篡党夺权”的莫大罪名，已在等着他。冠华一介书生，还认为这些都是误会，他说只要向华国锋等人解释清楚就可以了。谁知一个外交部长、中央委员此时连解释的机会都没有，任何人都不接他的电话。以后的命运也就可想而知了。

□ 摘自章含之：《跨过厚厚的大红门》  
~~~~~  
【亡灵祭坛】

傅雷之死

翻译巨匠傅雷的愤然辞世，乃是在1966年的一个孟秋之夜。9月2日的夜晚或3日的凌晨，58岁的翻译大师因不堪忍受红卫兵的殴打、凌辱，坐在自己的躺椅上吞服了巨量毒药，辗转而亡。两小时后，他的夫人朱梅馥从一块浦东土布做成的被单上撕下两条长结，打圈，系在铁窗横框上，尾随夫君而去。

没有谁会注意到这样一条消息。在一个恐惧四布、人命如蚁的年代里，“自绝于人民”的事是经常发生的。当女佣周菊娣失魂落魄地将二人亡故的消息报告给当地政府后，几个神情傲岸的片区警察经过匆匆的讯问就决定火化，甚至连近在北京的傅敏（死者的次子）也来不及向父母的遗容告别，就匆匆地掩埋、拉倒，像送走一盆过时的盆景。

几乎所有傅的亲属、朋友都痛悼了傅的英年早逝，谴责了林彪、四人帮的倒行逆施，实际上傅在此前已多次透露了死亡的消息，仿佛最后的几年不过是死神在挑选吉日。

1957年，傅以“亲美”、“反苏”的罪名被上海市作协开会批判凡十次之多，但因拒不承认“反党反社会主义”而无法戴帽。但到1958年的“反右补课”中，傅却再也无以幸免。在一次专门为他召开的批判大会结束后，傅被戴上了“右派分子”的帽子而沉重回家。见到夫人以后的第一句话就是：“如果不是阿敏还太小，还在念书，今天我就……”

1966年，当一场史无前例的恐怖主义浪潮席卷中国的时候，傅已预感到自己在劫难逃。他对来家探望的周煦良明言：“如果再来一次1957年那样的情况，我是不准备再活的。”而当“运动”才开始一月，他就向朋友们喃喃自语：“我快要走了，我要走了……”仿佛灵魂已急不可待。

而现在，这只昂首天外的天鹅终于等到了上路的机会。经过从这年八月底开始的四天三夜的查抄、罚跪，变着花样的辱骂、殴打，他觉得动身的时机已经完全成熟，大地上已失去了逗留的理由。他头朝天堂、眼望故乡，将一杯和有毒鸩的药水仰脖吞下。他不再妥协。

就这样，当第二天上午，女佣周菊娣按时起床准备为他打扫卧房的时候，发现平日生活像钟表一样刻板的译匠没有起床。他已经永远地睡了。

又大约过了一个多小时的时光，户籍警察左安民闻讯赶来，发现书桌上有一个火漆封固的包裹，上面写着：“此包由××路×弄×号朱人秀会同法院开拆傅、朱”，里面是几个装着钱、物的信封，以及一封由工笔小楷誊写而成的遗书，全文如次：

人秀：

尽管所谓反党罪证（一面小镜子和一张褪色的旧画报）是在我们家里搜出的，百口莫辩的，可是我们至死也不承认是我们自己的东西（实系寄存箱内理出之物）。我们纵有千万罪行，却从来不曾有过变天思想。我们也知道搜出的罪证虽然有口难辩，在英明的共产党领导和伟大的毛主席领导之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决不至因之而判重刑。只是含冤不白，无法洗刷的日子比坐牢还要难过。何况光是教育出一个叛徒傅聪来，在人民面前已经死有余辜了！更何况像我们这

种来自旧社会的渣滓早应该自动退出历史舞台了！

因为你是梅馥的胞兄，因为我们别无至亲骨肉，善后事只能委托你了。如你以立场关系不便接受，则请向上级或法院请示后再行处理。

委托数事如下：

- 一，代付九月份房租 55.29 元（附现款）
- 二，武康大楼（淮海路底）606 室沈仲章托代修奥米茄自动男手表一只，请交还。
- 三，故老母余剩遗款，由人秀处理。
- 四，旧挂表（钢）一只，旧小女表一只，赠保姆周菊娣。
- 五，六百元存单一纸给周菊娣，作过渡时期生活费。她是劳动人民，一生孤苦，我们不愿她无故受累。
- 六，姑母傅仪寄存我们家存单一纸六百元，请交还。
- 七，姑母傅仪寄存之联义山庄墓地收据一纸，此次经过红卫兵搜查后遍觅不得，很抱歉。
- 八，姑母傅仪寄存我们家之饰物，与我们自有的同时被红卫兵取去没收，只能以存单三纸（共 370 元）又小额储蓄三张，作为赔偿。
- 九，三姐朱纯寄存我们家之饰物，亦被一并充公，请代道歉。她寄存衣箱贰只（三楼）暂时被封，瓷器木箱壹只，将来待公家启封后由你代领。尚有家具数件，问周菊娣便知。
- 十，旧自用奥米茄自动男手表一只，又旧男手表一只，本拟给敏儿与×××，但恐妨碍他们的政治立场，故请人秀自由处理。
- 十一，现钞 53.30 元，作为我们火葬费。
- 十二，楼上宋家借用之家具，由陈叔陶按单收回。
- 十三，自有家具，由你处理。图书字画听候公家决定。

使你为我们受累，实在不安，但也别无他人可托，谅之谅之！

傅雷

梅馥

一九六六年九月二日夜

这是人类历史上只有为数不多的杰出心灵才能作出的超常反应。它清晰、周密，将智慧赋予人的坚忍和冷静发挥到了令人难以企及的程度。让我们回忆一下他在临终前的最后几天里所受的种种横暴：为了搜寻“反革命证据”，戴红箍的“红卫兵”挖地三尺、煞费苦心，甚至把傅家花园里的月季也连根拔掉；震耳欲聋的口号，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傅雷夫妇先是被罚跪在地，继而被人拉到长凳上戴高帽；……但这一切丝毫没有影响到这个人有条不紊地书写他的死亡文告，甚至连火葬费，保姆可能需要的生活补助，姑母首饰的赔偿额都一丝不苟地抄出，仿佛这一切在他心中早已酝酿成熟，现在所做的不过是照单誊录。

这和苏格拉底之死完全不同，这个同样是饮鸩而死的雅典人是至死都相信自己的无辜，而恰好是这“无辜”，鼓舞了他赴死的勇气。他坚信神明让他现在死去，不但避免了因年老带来的痛苦，而且雅典会因错勘贤愚而遭到永恒的报复。“如果不义地死去，这乃是那些不义地处死我的人的耻辱，因为，不义既是可耻的，不义地做任何事岂不都是可耻的吗？……我看，后人对前人的看法，是随着他们生前受不义的待遇或者行不义的事而不同的”（1）这个杀气腾腾的预言在后来得到验证，雅典的民主法庭因为错判哲人而蒙受了几千年的诅咒，而苏氏本人的道德学问却没有在这场无休止的争讼中贬值。

但傅雷有什么呢？难道他比这个雅典人更相信神所赋予的“永恒的正义”吗？“何况光是教育出一个叛徒傅聪来，在人民面前已经死有余辜了！更何况像我们这种来自旧社会的渣滓早应该自动退出历史舞台了！”，这个谦卑而自渎似的陈述表明这个东方文人对杀死他的权力以及代表这种权力的暴政并没有深刻的怀疑。那么，究竟是什么力量支撑着这个人坦然赴死？这个问题不妨容后商议。

耐人寻味的是，这两个从完全不同的信仰背景里生长出来的智者，面对死亡却显示了惊人相似的冷静：据柏拉图回忆，苏在众多弟子肝肠欲断的哭泣声中兴致勃勃地接过了盛有毒鸩的酒杯，脸上竟没有丝毫的慌乱和忧惧。当无情的毒药发作到腰部时，他掀开了脸上的白布，说：“克里托，我们应该还给阿斯克勒皮俄斯一只公鸡，记住这件事，千万别忘了。”从这个角度上看，傅就是苏格拉底在远东的忠实兄弟，他在遗嘱中事无巨细的钱款处理，不妨看作是对“苏式死法”的下意识摹拟。

除了在信仰观念上的先天差异外，傅与苏还有一点真正的不同。有资料显示，苏直到去世的那一天，他那个著名的悍妇还领着孩子到监狱里大闹了一场，而傅却至死都沉浸在神赐的幸福之爱里。

现在让我们费一点笔墨谈一谈朱梅馥，谈一谈这个温柔的妻子，慈爱的母亲，沙龙里的漂亮女主人。据与傅家有长期交往的朋友回忆，造化在这个女人身上显示了一种极其奇特的矛盾统一。受的是完全的西式教育，在音乐、书画、英文小说的鉴赏方面都有很高的造诣，但这些现代的文化训练并没有磨蚀掉这个女人天然的内在之美。她的性格、气质、应对事物的态度完全是东方古典社会贤妻良母的典型。在给儿子傅聪的信里，她这样解释自己：“我对你爸爸性情脾气的委曲求全，逆来顺受，都是有原则的，因为我太了解他，……（他）成年后，孤军奋斗，爱真理，恨一切不合理的旧传统和杀人不见血的旧礼教，为人正直不苟，对事业忠心耿耿，我爱她，我原谅他。”这种发自内心的真诚追随，这种对真理、正义力量的由衷敬畏，恐怕是现在一些半生不熟的女权主义者，自以为是“知识女性”，张牙舞爪的“女强人”们所无法理解的。她把东方女性的温存与高贵，坚定与自信，仁爱和牺牲发挥到了令上帝也为之落泪的程度。

让我们把目光收起，重新回顾一下她在1966年9月2日的下午，也就是她在辞别这个世界时所留给我们的最后信息。

那时杀心已定、去意已决。青年恐怖组织成员带着胜利的得意，绝尘而去。面对满地的狼藉，她对周说：“菊娣，衣物箱柜都被查封了，我没有替换的衣服，麻烦你到老周（煦良）家给我借身干净的来。”这是一个女人对世界的最后请求，那就是要体面地死去。

大约在晚上八点左右的样子，夫妇俩吃晚饭，朱对周说：“明天小菜少买点。”这是我们所能知道的，她留给这个世界的最后一句话。

我曾无数次地看过傅雷遗书的影印件，但每次面对结尾的签名时，我都要问自己：这“梅馥”二字究竟是傅雷的代笔，还是朱的亲笔题写？如果是后者，那么，我们可以想见一双女人之手将自己的名字最后一次签在丈夫的后面时那滴血的颤栗。

到现在，我们仍然不知道，而且永远不会知道他们夫妇在赴死前的最后几小时里商量过什么，但验尸报告告诉我们，傅比朱早死两小时。也就是说在这两小时里，一个女人要亲眼目睹自己相守34年的爱人先是喝下了毒药，继而痛苦地痉挛、抽搐，最后辗转死去。这对朱来说，实际上经历了两次死亡：前一次是心死，后一次是身死；前一次是精神亡命，后一次是灵魂投奔。

一个值得一提的细节是，朱在投缳自尽前，先将一块棉胎铺在地上，然后将方凳放上去——他的目的是，不让方凳踢倒时发出声响，影响了别人的休息。

三

到现在，我们不得不面对一个核心问题，那就是傅雷为什么而死？是死于“士可杀，不可辱”的人格悲愤，还是“文死谏，武战死”的道德律令？是死于儒家的入世不得，还是道家的超然解脱？是死于个人奋斗的穷途末路，还是国家信念的分崩离析？这些问题都不是一下能解决的。

可以肯定的是，与司马迁、“竹林七贤”、徐文长、李贽、龚自珍、鲁迅等一大批东方抵抗知识分子相比，傅雷其实并不像传说中的那么“叛逆”。他当初选择巴尔扎克的翻译，并不是出于个人的兴趣，而考虑更多的是政治的安全。翻译一个被全人类的革命导师封为“比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一切左拉都要伟大得多的现实主义大师”（2）理所当然地会得到国家意识形态的默许和支持。而饶有趣味的是，这个具有“了不起的革命辩证法”（恩格斯语）的作家却写了大量的既不“革命”，也不“辩证”的东西，这使得傅雷的翻译一时竟难以为继。

他在1964年一封致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郑效洵的信里，这样谈到他的翻译：“比较适合吾国读者的巴尔扎克的最优秀的作品，可谓遗漏无多”，可是另有一部份，“或宗教意味极重而以宣传旧社会的伦理观念、改良主义、人道主义为基调”；“或艺术价值极高，开近代心理分析之先河，但内容专谈恋爱，着重男女之间极细微的心理变化”；“……诸如此类名著，对我国现代读者不仅无益，抑且甚难理解”。他的结论是，不宜再译。

这其实是一种双重人格在艺术理念中的投影，一方面，西方进步的思想艺术使得任何妄自尊大的人都不可能闭目塞听；另一方面，来自某种先天的抗拒，又使他无法放弃对传统意识形态的本能留恋。

果然，在1957年，当国家意识形态以“阳谋”的手段诱使知识分子“陈情进表”时，傅雷竟然较早走出书斋，成为上海市政协的“左拾遗”。在一次以“特邀代表”的身份参加完“全国宣传工作会议”后，他这样写信告诉远在波兰的儿子：“想想有这样坚强的党、政府与毛主席，时时刻刻作出许多伟大的事业，发出许多伟大的言论，无形中但是有效地鼓励你前进！……照着我的前路，你得不辜负他老人家的领导才好”（3）。

痛切、热烈、天真无邪地为一个国家乌托邦奔走呼号。一切怀才不遇和乖张怪戾的激愤现在都离他而去了，他沉浸在了种族的廓大怀抱中。

——这种热情洋溢的投奔多少有点出人意料，但对一个有着明显士大夫气质的中国文人来说，一切似乎又是那么顺理成章。

而国家政权最终还是抛弃了他。

一场“和风细雨”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持续不到一个月，暴风雨就突然降临。随着一场全国规模的整肃运动严厉地开展起来后，傅雷立即以“亲美”、“反苏”的罪名被打成“右派”，痛苦回家。他的国家信念第一次遭到了重创。

当然，这也是一切儒式文人“治国平天下”梦想的必然结局。他们获得了他们为自己选择

的命运。也就是，当被一腔治世热血鼓荡起来的儒家文人，一厢情愿地去“治国平天下”的时候，他们没有想过的是，谁的“国”、谁的“天下”允许他们“治”和“平”？换句话说就是，当一个“国家”和“天下”属于一家一姓的时候，有什么办法能保证我们跑到别人的家里或祠堂里去“治”和“平”而不被家奴赶出？这个问题孔子本人没有解决好，他把这个问题留给了他的徒子徒孙，而他的徒子徒孙，包括屈原、杜甫、陆游、岳飞、方孝孺、王国维在内的一连串风流高标的人物，除了跳江、冤死、愤愤不平以外，似乎也没有什么好办法。

那么，按照儒家的阶梯理想，一个士大夫剩下的就只能是“齐家”，而“家”是微缩了的“国”，“国”是放大的“家”。“齐家”是“治国”的预备。因而，《傅雷家书》才以其与国家道德的一致性，成为与早期的《颜氏家训》、近世的曾国藩、李鸿章的“家书”一起为世所重的东方教子篇。一个有趣的事实是，在直接导致傅雷自杀的那场大抄家中，“红卫兵”搜出了“家书”的原件。他们满以为写的尽是“三反言论”、“叛国恶词”，谁知傅雷在里面写的多是教导儿子如何“爱国”之类。于是，他们相互传阅，读得入迷，竟至于忘了抄检。可见，批斗傅雷完全是一场误会，一场无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误会，误会的原因在于年轻的无产阶级由于学识浅陋而无法理解早期无产阶级的良苦用心。

而最终是傅聪的出逃宣告了傅式“家国”教育梦的彻底破灭。傅聪，这个被他用棍棒和威吓抚育起来的长子，由于害怕回国后被逼加入到“父亲揭发儿子，儿子揭发父亲”的罪恶循环中而在波兰学成后驾机出走英国。这个在今天看来不失为明智的举动，却对狷直的傅雷构成了一个晴天霹雳般的打击。毫无疑问，一个一心渴望“精忠报国”的旧式父亲无法容忍自己苦心教导的儿子竟然跑到“敌国”深造。家与国，人与他的种族，亲情伦理与国家伦理这时再次形成了紧张对抗。

据传记资料显示，他有整整两昼夜粒米未进，痛苦，震惊，忧虑，寝食俱废……他相信自己的儿子，但他更相信自己的教育方式，他不能明白，而且永远不能明白的是，当他真诚地按照传统意识形态要求的“爱国”标准去培养一个“治国平天下”的干才时，那个“爱”的动作只是幻想中的一厢情愿，而它所“爱”的对象——“国”，只是一个在水一方的乌托邦，华衣艳裳、秋水频传地出现在儒家几乎所有的典籍和诗文中，但事实上，它从来没有“爱”过我们。

行文至此，我想明敏的读者已经看出了傅雷在他的最后几年里精神步步退守的大致轨迹。作为一个国家信念濒临崩溃的老人，晚年又遭到了儿子“出逃事件”的沉重打击，已经不大可能再相信除了个人奋斗（或者说成“消遣”）以外的事情了。他的编年史家告诉我们，大约从1959年起，他基本上闭门不出、埋头著述。在贫困（4）和神经衰弱、关节炎、眼病等多种疾患的折磨中，译竣了丹纳的《艺术哲学》，巴尔扎克的《搅水女人》、《都尔的本堂神甫》、《比哀兰德》和《幻灭》三部曲等多种著作。此外，他开始用大量的时间研习书法，搜求碑帖、字画和各种小古董，并专注于嫁接艺术，酷爱月季、玫瑰，并成功地培育出英国玫瑰达50多种。

这是一个传统士大夫的最后选择。也就是当“治国平天下”、甚至是“齐家”的梦想也相继败落以后，正是这些拓片、碑帖和异类花鸟掩护了众多英雄向精神丛林的深处撤退。在那里，他们为自己的灵魂敷药。历史学家谓之“修身”。

而最终是“红卫兵”急骤的敲门声击碎了桃花源主人欲辩忘言的“修身”清梦。也就是当心性高傲的主人一觉醒来，发现温顺的狼毫、宁静的书台、旖旎的玫瑰花丛已不复存在，他已别无退路。圣人说，“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但他没有告诉我们，别人不许“独善”的时候我们怎么做？高超的哲人也教我们，“入世”不得就去“出世”，但他们没有告诉我们，当“世界是我们的”，出世也不得，就是无“世”可“出”的时候，我们怎么做？傅雷用自己的方式回答了我们，那就是——离开。

这和屈原完全不同。屈原是他自己国家的主人，他最后选择自杀是他不愿意与一个昏聩的国王一同在世。因而，在怒气冲天地问过172个有关天文学方面的问题以后（见《天问》），愤然自沉，以明心志。而傅雷是至死都相信自己是国家的罪人，这一点，你只要看一下遗书的第一节就会知道。

但我也同时注意到了傅雷性格中的另一面，那就是他的愤世嫉俗。

与屈原的愤世嫉俗导源于他的政治受挫不同，傅雷的愤世嫉俗几乎是天生的。大约在他四岁的时候，他的父亲因被当地的土豪劣绅诬告，入狱三月，幸得母亲倾其全力救出，但终因病加重，不久便衔冤而逝。家道从此迅速中落，两弟一妹相继夭亡，只剩孤儿寡母，相依为命地过日子。我没有足够的理由说傅雷的愤世嫉俗起因于他的幼年失怙，但毫无疑问，这些童年时代的悲惨遭遇为傅雷早期人格的成长起了十分不良的影响。

他取名为“雷”，字“怒安”（取“文王一怒而天下安”之义），把自己的住所叫“疾风迅雷楼”，并赫然印在自用的稿纸上。但他忘了一句来自神秘年代的古老谶言：“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道德经》第23章），仿佛一切早已注定。据傅聪回忆，从他记事起，父亲就是一个极端愤世嫉俗的人。因而到傅雷出事后，他好像完全理解，仿佛“早已知道他会走上这条路的。他不可能不如此……”（5），“我永远不能忘记他在家里的慷慨激昂的谈‘死谏’，所谓的‘抬了棺材见皇帝’。他对这中国文化中特殊的悲剧精神，很有感受。我父亲一开始就是 martyr（烈士）的典型，这就是他的 karma（命运）”（6）。

因而，如果仅仅把傅雷的死归结为“士可杀，不可辱”的道德律令，那就大错特错了。傅雷是他自己精神世界的王，这是他所有痛苦与愤怒的源流。他不是因为受了辱才去自杀，而是因为要去自杀才觉得受了辱。

而我必须向读者指出的是，愈到后来，这个孤独而庄严的王愈是显示出了一种奇特的混乱统一。拘谨与生动，丰富与单纯，入世与出世，顺民与叛臣，希腊精神与中国式的激愤奇妙而不可思议地集于一身。而最后是自杀结束了这种混乱的分裂气质，从而也及时地阻止了一个发疯、投诚、精神严重扭曲的可怕局面的发生。而实际情况是，傅雷即使活着躲过此次劫难，他也无法面对以后十年更为严酷的祸乱。对此，我不想和什么人分担庆幸，我只想以我的文字写出我的悲哀和追思。

四

在所有关于傅雷的悼念文章中，杨绛的《忆傅雷》可能是我感到最为奇怪的一篇。在短短的不到五千字的文章中，竟然有十几次提到“钟书”：一会儿说“也许钟书是唯一敢当众打趣他的人”（7）；一会儿说“有人说傅雷‘孤傲如云间鹤’，傅雷却不止一次在钟书和我面前自比为‘墙洞里的小老鼠’”（8），而且“这话不是矫情，也不是谦虚。我想他只是道出了自己的真实心情”（9）；一会儿又说“钟书建议他临什么字帖，他就临什么字帖，钟书忽然发兴用草书抄笔记，他也高兴地学起十七帖来，并用草书抄稿子”（10）；……，一个特行独立的傅雷在杨的笔下忽然变成了一个唯命是从、亦步亦趋的小学生，使人就不知道这篇文章是要悼念亡友，还是表扬夫君？

尤其耐人寻味的是，文章写到傅雷在一次全国性的翻译工作会上，因举了许多错译的例句而招致许多“例句主人”的非议。这对一个求真求实的知识分子来说，大概是再正常不过的，但“钟书”却去信责备，杨绛也深以为非，并献计说：“假如傅雷打头先挑自己的错作引子，或

者挑自己几个错作陪，人家也许会心悦诚服”（11），这就把一场真诚坦率的学术论争变成了一种世故狡狴的人际权谋，同时也使我对一切东方逸民型知识分子的人生教诲保有了适度的警觉。

当然，在一大堆怀旧、念亲、谬托知己的文章中，还有一些更为莫名其妙的篇目。那就是说，傅雷之死是一个代价，是一个“我们”到达光明前途的路上必须经历的一次“曲折”，虽然“二十多年来给数以万计的祖国优秀儿女所造成的惨运，是多么的惊人，而今天终于普遍得到改正、昭雪，又是一个多么得人心的政治措施”（12）。并且“有许多人在这场灾祸中被伤残了，但有许多人却由此受到特殊的、像钢铁受到烈火一样的锻炼，而更加显露出他刚毅锐利的英精”（13）。

一代翻译巨匠就这样成了别人锻火的材料。他们夫妇以绳索和毒药为代价捍卫生命的尊严本身并不具有独立的价值，而只是为了给别人提供一次“得人心的政治措施”的机会。因为众所周知，如果没有“二十多年来给数以万计的祖国优秀儿女所造成的惨运”，那么“一个多么得人心的政治措施”就无从表现。

——幸好傅雷夫妇虽然“伤残”了，但有许多人却因此得到了“锻炼”，变得更加“刚毅锐利”了；如果傅雷夫妇虽然“伤残”了，虽然被投入了炉中，但许多“钢铁”并没有得到“锻炼”，反而变成了软泥，不但没有变得更加“刚毅锐利”，反而更加心安理得、蛇行匍匐地为刽子手擦拭刀具，那么，傅雷之死价值何存？作者显然没有回答我们。

我只知道如果照此逻辑推断下去，那么，楚怀王就是好的，因为正是因了他的流放、迫害，屈原才孤愤发难，写出《离骚》；宋高宗和秦桧也不错，不是因为他们昏聩专断、陷害忠良，怎么能有岳飞的全忠保义，青史留名？历代极权王朝都可以，要不是皇权政治的黑暗和专断，李白、杜甫、苏东坡、王实甫和曹雪芹等历代文人怎么会怀才不遇，从而写下了那么多震烁古今的杰作？奴隶制度也不坏，你想要不是奴隶主的皮鞭和刀剑，那些奴隶会自告奋勇地背砖、挖土、扛石头，喜出望外地去修兵马俑和长城？

中国人能把一切悲剧都转换成喜剧，能把一切现实中的苦难都转换成精神上的快乐赶集，能把一切杀人、暴虐和流血都偷梁换柱成人民群众的迎神赛会。1979年4月，傅雷夫妇的追悼会在上海隆重举行。会上有人郑重宣布，1958年把傅打成“右派”是错误的，“文革”中傅雷夫妇所受的诬陷迫害也应平反昭雪，并彻底恢复其政治名誉。而饶有趣味的是，主持为傅雷“平反”的正是当年整他、“打”他的机构——上海市作协，这就使得一场血淋淋的吃人事件变得扑朔迷离起来。

在这里我们必须注意吃人者所遵循的语言逻辑：那就是说，把你打成“右派”是错误的，但“打”你本身却并没有错；把你迫害致死是错误的，但即使是错了，我也可以不为你“平反昭雪”，现在已经为你“平反昭雪”了，这正好体现了我的“实事求是”——否则，你就无法解释凶手为什么仍然有资格坐在主席台上为死难者“恢复名誉”。

这实际上是为以后制造新的恐怖运动提供逻辑铺垫。它的背后是一种无所不在的“恩主”心态。有了这种心态，一个人就可以对另一个人任意处置而不受责难。比如，一个人打了另一个人，他可以说，我虽然打了你，但我已经不再打了，这就是一种恩赐，他背后的潜台词是，我本来还可以继续打你；依此类推，我虽然继续打着你，但因为我没有杀死你，这就是一种恩赐；我虽然杀死了你，但我本来可以让你死得痛苦，比如凌迟、剜心等，但我没有，我为了让你快速死去，用的是枪毙或注射，因而，这就是一种恩赐；我虽然让你死得很痛苦，但我本来可以连株你的家人或九族，但我没有那样做，我只是让你一个人死去，因而，这也是一种恩

赐；……

这种高高在上、包打天下的逻辑最初是以隐蔽的方式出现在一些强盗、奴隶主和个别“通天教主”的潜意识里，后来在国家流氓化以后，就被一些独裁者奉为圭臬，并几乎成为上世纪半个世界的立国原则。

它的前提是权力，是无所不能的权力，是一部份人天然地认为自己对另一部份人拥有一种绝对的、不容怀疑的支配权。包括他的生命、幸福乃至活着的意义都必须寄托在“我”的身上才能获得，否则，“我”必将利用巧取豪夺来的国家机器宣布这个人为“人民公敌”。这种上升为巫术的国家宗教，基本上不承认人的生命是从上天那儿得来的。他（她）的独立、自由以及一切生存、创造、表达意见的权力都不是神赐的，而是“我”赋的，只要我愿意，我就可以给予，而且这并不影响我在适当的时候迅速抽回。

就这样，人开始了扮演上帝的漫漫征途。万军之领袖以及追随者在无数香客的簇拥下登上了一座由砖石垒成的城楼。在那里，他发布命令，接受朝觐，并晓谕各族人民，要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并只有按我手指的方向前进，你们的灵魂以及肉身才能进入流着奶与蜜的耶路撒冷。

在这里，我想强调一下人民的作用。一场规模空前的造神运动，没有人民的参与是不可想象的。人民，而且只有人民，才是创造神祇的真正动力。人民说，要有神，于是就有了神；人民说，这神是真的，于是就焚香灼臂，磕头礼拜起来；人民看这是好的，就把城楼上的红漆当作西奈山的神光电火，就地举行起各种献祭仪式来：他们有的遗弃了家小，有的殴伤了父母，有的杀死了老师，有的把在不同阵营的兄弟的尸首吃尽，连一个脚底板也不留存。这就是人民在“站起”以后所做的所有事情。

反观这场长达数十年的种族骚乱，只有为数不多的人是没有罪的。如果以棒杀傅雷为例，那么就只有一个人是行义的，那就是江小燕。

这个傅译名著的普通爱好者，这个与傅家非亲非故的无名女子，只是因为一个偶然的機會，在钢琴老师的家里，获悉了傅雷夫妇愤然弃世的消息，就立刻变得内心不安起来。当她从傅家保姆周菊娣那里得知，凡自杀身亡的“黑五类”，一律不准留尸骨，就毅然决定了自己的营救行动。她瞒过父母，一脸忧戚，冒险来到了寄存骨灰的万国殡仪馆。那里的工作人员被这个从天而降的傅雷“干女儿”的泪水打动，答应把骨灰交给她。可等到一堆鳞片样的尸骨端到她面前时，她才发现自己根本没有钱为傅雷夫妇买一个骨灰盒。于是从殡仪馆的登记簿上，她查到了朱人秀的地址，在朱的帮助下，她买了一个大塑料袋，将傅、朱的骨灰装好，并以“怒安”为名，寄存于上海永安公墓。

焚香举哀，以礼敬拜，一切安顿就绪，她回到家中，提笔给中央领导写了一封信。详细地报告了傅雷夫妇负屈身亡的经过，希望能昭雪英魂。可信一寄出，她就立即因替“老右派”鸣冤叫屈被打成“反革命”，十几年来，一直过着一种含辛茹苦、宵衣旰食的悲惨生活。

一个二十来岁的姑娘，一个普通的文学爱好者，她知道什么叫“右派”呢？难道她比我们的“学者”、“作家”和“领导”更能明白巴尔扎克以及“资产阶级文学”翻译的价值么？肯定不是。指引她的仅仅是一种内心深处的善良天性。换句话说，在黑暗到来的一瞬，她听从的仅仅是一种良知法庭的命令。然而，正是这个简单的“听从”使她的修为超过了所有“学者”、“作家”和“领导”的一切凭吊、赠谥和谀墓文章。某种程度上，她承担了一个种族集体的罪恶。

1979年4月，傅雷夫妇的骨灰盒在庄严肃穆的气氛中移入上海革命烈士公墓。一别祖

国二十多年的傅聪，第一次回国就赶上了父亲的追悼会，百感交集之余，得知父母的遗骨能奇迹般地保存下来，全仰仗于一个陌不相识的“干妹子”，就和胞弟傅敏四处打听。见到江后，他们一再表示要“有所谢意”，但这个娟媚式的女子只是淡然一笑。出于礼貌，她只接受了傅聪音乐会的一张入场券，一俟音乐会结束，她就默默地离去。像一滴水融入大海，像一片树叶落入深秋的荒原，从此再也没有找过傅氏兄弟。

注释：

（1）引自色诺芬《回忆苏格拉底》第187页，商务印书馆，1984年9月版。

（2）这是恩格斯称颂巴尔扎克的话。引自《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462页。

（3）引自《艺海清辉·傅雷》第118页，段文菡著，山东画报出版社，1998年10月版。

（4）傅雷是一九四九年以后少数几个没有单位，靠稿费生活的人。但在他划为“右派”以后，出版社惧于政治压力，要求他用笔名出版，遭到他的拒绝，生活一度陷入困顿。

（5、6）引自《傅雷与他的世界》第71—72页，金圣华编，北京三联书店，1996年4月版。

（7、8、9、10、11）均引自杨绛的《忆傅雷》一文，引书同上，见第13—17页。

（12、13）引自楼适夷《读家书，想傅雷》一文，见上书第129—130页。

□ 转载自《世纪中国》

~~~~~

## 【往事追忆】

### 红卫兵小报和我（二十）

• 周孜仁 •

（续上期）

战地重新平静下来，满场一派狼籍。后来，对方又组织了几次反冲锋，都无功而返。该打扫战场了。

那一辆作指挥车用的大客车开来楼前地坝上，说是接运伤员先行返回。我的小腿不知何时被石块击中，这才发现已肿得老粗，算得伤员了，自然被劝上车。顺带的任务是把俘虏们解回重大。所谓押解，其实很简单。俘虏们都被捆绑得十分结实，像箍桶一样，用绳子上上下下扎了好几道箍。怕他们叫，又从地上胡乱拣些破布、臭袜子往嘴里一堵。然后像木料一样塞到座位下面。动弹都不可能，反抗绝不会发生了。让人担心的倒是：满车都是伤病员，如果路上遭到对方武装拦截，待会儿全身被捆、嘴巴被堵、像木头一样塞在座位下面的，就该换成我们了。为了掩护，车前挂了个“31路”公共汽车标牌。全身太脏，大家就把衣服反穿：虽然依旧很脏。一路提心吊胆，遇了几处盘查，还好，都是八一五的，放行了。回学校把俘虏交给了学校的302，大大松了一口气了。

当时重大有两只专业武斗部队，一曰301，性质属野战，成员多为敢作敢为、敢拼敢打的血性汉子，比较受人尊崇。302就不同了，负责校内治安，名唤卫戍部队，可大家更喜欢叫他们“乡丁”，以为这帮人不敢上战场，只敢在学校耀武扬威，系属：“门坎猴”。

回校第二天，有“门坎猴”兴冲冲来叫我，好像发现了新大陆，说抓到一个《红岩》报编

辑，要我去帮忙审问。现在我已记不起那俘虏姓甚名谁，面貌更不清楚：因为他眼睛一直蒙着，跪地板上。几个同学正在审问。有人还踢他小肚子一脚，我忙劝开了。并非政策水平高，前面说了，在战地，我也打过人，在捆猪捆狗一样捆扎俘虏时，在向他们嘴里塞进肮脏不堪的破布、破棉花时，我没有手软过。但事情一旦归于平静，我内心一息尚存的良知还是抬起了头。我莫名其妙觉得他有点可怜，我问他什么他都回答，而且回答得还忒老实。对于《红岩》报，其实我也知道的不多，于是就胡乱问：你写过些什么毒草？他回答写过什么什么什么，反正我也不知道。很快无话可问，于是就搜身。搜出几斤粮票，几毛钱，还有几张照片。其中有几张是缙云山狮子峰顶拍照的，四个人，拿一面“八三一”战旗，表情凄然，迎风而立。据他说是八三一被打成反革命时的留念。我马上宣布说是反动照片，必须销毁。他不表示异议，只申辩说，其中有一张是他和姐姐的合影，而他姐姐远在新疆，好不容易来重庆看他。他说钱、粮票和“反动照片”都可以交我们处理，他和姐姐的照片务请予以留还。我记得我说得很肯定：可以满足他的要求，而且钱和粮票也绝对如数退还，审问就此结束。至于后来乡丁们把他怎么处置，我就一无所知了。听说是写了检讨，就放了。前面提到的《八一五战报》上的揭发材料，估计就是出自于这些“俘虏”之手。

说八一五优待俘虏，当然也有虐待的。这就得看什么情况下俘虏的？还看俘虏是落在了什么人手上？我看见虐待俘虏至少有这么二次：（考虑到可以理解的原因，我不便公开虐待者的名字）一次据说是捉奸细，抓来一个女老师。文工团的。人不算漂亮，正因为不漂亮，所以就不像漂亮女孩子那般喜欢出风头，让大家对她众星拱月。但这位老师演技不错，在参演阶级教育剧《年轻的一代》时，她曾出演革命老人肖奶奶B角，演得出神入化。因此我们忒尊敬她。不知道谁告密，说她奸细，就被几个原来非常尊敬她的乡丁抓了来，捆在一张凳子上，用烟头烧她的手臂，烧得她嘤嘤哭叫。我从门口路过，没进去，这么多男人对付一个女人，而且是老师，我难以接受又无法评价，只能走了。

还有一次，我推门找一个很要好的同学。他也是“乡丁”。他正忙着打一个人。这人是从河运校捉来的。像箍桶一样，全身被箍了好几道箍。“乡丁”打起来就很方便。他把铝合金棒举得高高的，然后劈柴一样猛砸下去，又举起来，又砸。每打一下，“俘虏”就惨叫一声，像木头一样在地上滚一个圈。“乡丁”已经打得很累了，大汗淋漓，索性把衣服脱光，就穿条底裤，又打。见我进门，他告诉我，说这是个砸派。那表情有点其乐无穷似的。这件事，在以后的相处中成为我心中的一团阴影。

（未完待续）

---

|                       |             |          |
|-----------------------|-------------|----------|
| 本期编辑：                 |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 《CND》总编： |
| 华新民（美国）               | 吕青（加拿大）     | 熊波（美国）   |
|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021-8602 |             |          |

投稿专用地址：hxwz@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  
如需有关《CND》和《华夏文摘》各种免费期刊和服务的信息，获取  
中文文件：hxwz-info@cnd.org 英文文件：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万维网服务站（WWW）地址：<http://www.cnd.org/>

---